

# 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 “南都口述史”研究

白红义

## 摘要

新闻业不仅参与到历史事件的记忆中，也在从事着有关自身的记忆工作，行业中的事件、人物和组织都会成为集体记忆的对象。本文以《南方都市报》为庆祝创刊18年而在微信平台上设立的“南都口述史”为例，讨论在这样一个封闭又开放的记忆空间里，记者如何作为一个阐释性记忆共同体来纪念他们曾供职过的新闻组织，并分析这种集体记忆对于南都和中国新闻业的意义。

## 关键词

《南方都市报》、口述史、阐释性记忆共同体

## 作者简介

白红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创新智库团队成员（上海，200235）。本文是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项目编号：15BXW013）的初步成果，同时还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创新智库的资助。电邮：loiter2001@126.com。

## Journalists as an interpretive mnemonic community: The case study of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s oral history

BAI Hongyi

## Abstract

Journalism not only participates in commemorations of historical events, but also commemorates itself, including journalistic events, news peoples and journalistic organizations. The article regards the role of journalists as an interpretive mnemonic community via an investigation of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s oral history. Through the accounts they give about their organization, the article try to explore how journalists commemorat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and its meanings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Keywords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oral history, interpretive mnemonic community

## Authors

BaiHongyi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entitled “A Study on Journalistic occup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fund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No.: 15BXW013).Email:loiter2001@126.com.

### 一、新闻业中的记忆工作

伴随着中国新闻媒体遭遇普遍性的营收下滑,一系列停刊、离职、裁员、缩版等信号都预示着中国新闻业进入了“危机”时刻。在行业期刊、报刊文章、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等不同的媒体平台上,此类“危机”话语随处可见。将当前新闻业面临的状态形容为一场危机,也潜在地给“危机”前的新闻业发展贴上了繁荣、发达等标签,并预示着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在今昔对比中,怀旧成为有关新闻业发展的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绪。对逝去时光的怀念表达了新闻从业者们对新闻业“黄金时期”的一种集体记忆,这种怀旧往往在两类特定的事件发生时得到更为集中的展示:一类事件与新闻从业者有关,如著名新闻人的逝世(如杨伟光、王钧)、退休(如江艺平、敬一丹、朱伟)和转行(闫丘露薇、张力奋、秦朔)等;另一类事件则与新闻组织有关,如报纸的停刊(如新闻晚报、杂文报)、创刊纪念(《三联生活周刊》20年、《南方都市报》18年、《东方早报》12年)等。每一个具体案例发生之时都能引发大量的纪念性文字,这些频繁出现的针对新闻业的记忆工作作为研究者讨论新闻业中的集体记忆提供了契机。

在讨论新闻业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时,实际包含着两个面向:一是新闻中的记忆(memory in journalism),另一是新闻业的记忆(memory of journalism)(Meyers,2007)。前者是把新闻业当作社会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它所生产出来的新闻报道等产品成为其他社会群体进行记忆工作的重要资料。后者则是把新闻业自身当作集体记忆的对象,围绕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媒体、人物、事件、报道等展开的记忆工作。传播学界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实际主要集中在前者,而对后者的关注略有不足。正如Meyers(2007)所说,这些研究很少关注到记者在作为他们所报道的社会记忆的叙述者外,同时也是他们自己专业共同体的记忆叙述者。如果只是把新闻记忆当作对过去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报道的派生之物,显然忽略了记者作为一个记忆主体的能动性,他们在塑造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之时,也在积极地建构关于

自身行业的集体记忆。现有对新闻业集体记忆展开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

第一，以事件为中心的记忆工作。新闻常被称作“历史的初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称为“记忆的初稿”(Kitch,2008)，意指记者对当时事件的报道可能会成为未来历史记忆的重要素材。因此，通过考察重大事件的集体记忆来探究新闻业的作用就成为一条重要路径。Zelizer(1992)通过肯尼迪遇刺案研究了美国电视记者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的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对肯尼迪遇刺的媒体报道进行了一个长时段的研究，详述了电视记者这一新兴群体如何保持其专业地位：先是通过他们对刺杀肯尼迪的报道，此后是通过他们讲述的关于刺杀的故事。作者认为，记者运用提喻、省略、拟人等不同的叙事技巧来加强他们作为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权威发言人的地位，其要旨不在于他们知道什么，而是他们如何呈现他们的所知。与其他阐释性群体相比，记者使用叙事既巩固了他们“告知真相”的地位，也维持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Schudson(1992)在对水门事件集体记忆的研究中也专门考察了新闻业的作用，但他只是把新闻业作为集体记忆中的一个塑造主体来看待。作者敏锐地发现，美国新闻业通过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神话的塑造完成了对水门事件集体记忆的“神话化”：一是“水门事件中的新闻业”，另一是“新闻业的水门事件”。前者讲述的是《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记者单枪匹马将美国总统拉下权力宝座的“神话”，后者则强调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新闻业，激发了调查性新闻的崛起，让新闻业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声望，更富攻击性。张志安和甘晨(2014)对孙志刚事件集体记忆的研究也发现，《南方都市报》作为首发媒体，在有关孙案的记忆叙事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媒体及社会力量的作用，将孙案简化为一篇报道废止一部恶法的“神话”，树立其新闻权威。有趣的是，记者个体的回忆和叙事则试图打破这些“神话”。

第二，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忆工作。每个行业都有追溯和推崇先贤英雄的传统，作为整合行业内部成员的重要手段，新闻业也不例外(施喆,2000)。特别是在著名新闻人逝世之际，他们取得的新闻成就得到集中的纪念，也为新闻界建构行业内的集体记忆，塑造新闻权威提供了契机。Carlson(2007)研究了两位著名新闻人Mary McGrory和David Brinkley逝世后美国媒体的纪念报道发现，当下的新闻人通过回顾前辈的职业生涯来塑造新闻业的集体记忆，将前辈的职业成就视为新闻界所秉持的新闻价值与规范的成功，强调在当下继续坚守这些核心价值的重要性。当名主播Walter Cronkite于2009年6月去世时，美国媒体将这位前新闻记者的生平事迹放上了新闻头条，纪念报道把Cronkite跟众多美国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Carlson,2012)。对Cronkite逝世纪念报道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除了表达对过去的怀旧情绪,电视记者们还将Cronkite从业时被少数强大的电视网支配的电视新闻与当今碎片化、异质性的新闻环境相比较,记者们的集体记忆揭示出电视新闻的矛盾状态(Carlson & Berkowitz,2012)。这种新闻界借助回顾已逝新闻人生平而进行的自我论述对新闻界内部有整合作用,对外则提高了新闻业的合法性(王悦,李立峰,2014)。在中国,著名新闻人江艺平的退休也引发了新闻从业者对她的怀念。作为一位在新闻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新闻人,江艺平一直被视为《南方周末》乃至南方报业的文化符号。她的退休虽然只是一次正常的人生抉择,但在新闻圈内引发的讨论却不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涉及到更广的职业、社会等因素。通过这样一个纪念的契机,参与讨论的新闻从业者们也型塑了关于中国新闻业的集体记忆(白红义,2014)。这些被纪念的新闻人通常都是在业内享有崇高地位的职业偶像,堪称后人效仿的角色模范。此类研究多半是在新闻权威的理论框架下,探讨纪念话语如何将逝去的新闻偶像及其时代理想化,如何以此为契机来对当下新闻环境进行批评,从而更新或强化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李红涛,黄顺铭,2015)。

第三,以组织为中心的记忆工作。与前两种取向的记忆工作研究相比,将新闻组织作为记忆工作的中心的研究数量较为有限。Meyers(2003)对一份以色列新闻史上有名的煽情激进周刊进行了研究,他使用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的概念,分析以色列新闻业在不同时代如何讲述和定位这份周刊,如何利用对“过去的叙事”来界定自己的职业共同体,以色列新闻业对该周刊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以色列新闻记者们强化自身专业地位的一个策略。Gilewicz(2015)把分析对象聚焦在四家“失败报纸”的停刊前的最后一天的内容。作者发现,记者们使用集体记忆来建构他们工作的意义,具体来说,他们使用怀旧记忆的技巧来阐释报纸关门的当前意义,用未来记忆的技巧来强调他们的工作应该被记住。郭恩强(2014)以《大公报》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各方以此为中心建构有关《大公报》话语场过程的不同表现。他的研究发现,中国新闻界在有关自身的关键事件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反思性“阐释性社群”,而只是建构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状态的“话语社群”。但中国新闻界会根据媒体性质、自身地位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话语策略与《大公报》进行勾连或脱勾,并以此重塑本行业的职业权威和集体记忆。

从这三类针对新闻业的记忆工作的研究可以看出,记者通过特定的话语实践在集体记忆的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接续上述研究对新闻业自身集体记忆的关注,但在具体的切入路径上有所不同。第一,笔者更强调记者在有关新闻业自身记

忆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现有研究虽然比较多地研究了各种记忆文本, 但却不太重视记忆文本的生产者。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忆工作中, 记者只是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的一个塑造主体, 还面临着其他社会主体对于事件阐释权威的争夺。如果说, 在事件取向的集体记忆研究中, 记者的主体地位处于隐而不彰的地位, 那么在叙述新闻业的记忆时, 就不能不突出记者在其中的重要性。而在以人物和组织为中心的记忆工作中, 虽然记者作为叙述主体, 直接参与到建构新闻权威的过程, 但在研究中也鲜少有人着力论述记者的作用, 以致记者作为记忆主体的角色被边缘化处理(Zelizer,2008)。只有在Meyers(2003)对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份激进煽情周刊HaolamHaze的研究中, 记者成为了集体记忆的主体, 讲述新闻业自己的历史, 构建新闻业本身的集体记忆。

第二, 笔者希望从新闻职业话语的角度来探究记者如何建构关于新闻业的集体记忆。这里的新闻职业话语是指新闻从业者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进行阐释的“内部话语”或“行业话语”, 此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媒体的纪念报道等正式的记忆文本进行分析, 而笔者则更希望能将记者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下生产出的关于新闻业自身历史的叙事与回忆的记忆文本均纳入分析。与新闻报道所代表的记忆文本相比, 这些新闻职业话语更能直观地体现出记者作为记忆文本的生产者的自我认知, 而近些年来频繁出现的针对新闻业的话语实践则为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研究新闻业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新闻从业者虽然未能在整体上形成一个Zelizer(1993)所谓的阐释共同体,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却同样可能产生相对一致的解读方式, 比如这里所要研究的关于《南方都市报》的集体记忆。Meyers(2003)进一步提出记者是一个阐释性记忆共同体, 意指针对新闻业的历史形成一套共有论述和共同的解读方式。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在中国新闻业中的讨论, 希望探究记者在记忆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第三, 笔者将针对新闻业的记忆工作视为一种边界工作, 以此回答新闻业的集体记忆究竟有何意义。现有研究通常将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勾连起来, 只不过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忆工作研究中, 由于历史事件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 新闻权威的建立只是记者参与重大历史事件报道后的一种“阐释性的副产品”(interpretive byproduct)(Meyers,2007); 而以人物和组织为中心的针对新闻业本身的记忆工作, 更是成为一个直接建构、调整与强化新闻权威的过程, 显示出集体记忆与新闻权威之间的紧密联系(白红义,2014; Carlson,2007,2012; Carlson & Berkowitz,2012; Meyers,2003)。在中文文献里, 张志安和甘晨(2014)对孙志刚案的

集体记忆的研究、白红义(2014)对报人江艺平退休的个案研究、郭恩强(2014)对《大公报》百年纪念活动的分析都延续着这一思路。除了集体记忆外,新闻权威被建立与巩固的其他方式也值得更多关注,近年来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作为塑造新闻业文化权威的一种特殊手段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白红义,2015)。记者从事的有关新闻业的记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成为一种边界工作,比如有关美国著名新闻主播Edward R. Murrow的集体记忆就被美国主流媒体和博客用来协商新闻业的资格边界(Berkowitz & Gutsche,2012),美国电视记者对David Brinkley、Peter Jennings、Walter Cronkite、Mike Wallace等已逝新闻主播的回忆也在不断建构何为好的新闻实践的边界(Carlson & Berkowitz,2014)。由于边界工作主要围绕话语、修辞等角度展开,记者作为新闻职业话语的主要生产者,自然也就成为边界工作的主体。

## 二、研究案例:南都口述史

本文研究的案例是南都口述史,这是2015年《南方都市报》为纪念该报创刊18周年所做的一个新媒体纪念项目。1997年1月1日,《南方都市报》正式创刊,到2015年1月1日,南都正好走过18年。18岁是通常认为的一个人成年的日子,用人生的成长隐喻报纸的成长,不仅是对南都已经走过的18年表达祝福,更充满了对报纸未来的期许。在南都推出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专门在微信平台上设置了一个“南都口述史”的页面,为曾经和正在供职于南都的新闻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回顾、纪念的平台。以往新闻媒体多通过设立纪念专题或者出版专门的图书来庆祝创刊周年,而现在新媒体技术被广泛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各种纪念活动的展开。此次“南都18”生日会系列庆祝活动特别强调多媒体方式互动,“南都口述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新媒体技术,南都打造了一个特殊的“记忆空间”(memory space):从技术层面看,这个记忆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专题,在空间内撰写文字。由于互联网的无远弗届,它还超越了地理空间的局限,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进入这个记忆空间,吸引了大量已经离开南都的口述者。但从实际运作来看,它又是封闭的,只有曾经或正在《南方都市报》工作过的人才会在这一页留下文字。也就是基于这个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记忆空间,参与纪念写作的新闻从业者才构成了一个特定的记忆共同体。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引入,这个记忆空间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首先,特殊的接力机制。至少从口述史专题呈现的形式来看,参与记忆写作的记者多数是受邀而来。口述者可以在页面最后点名他想邀请的人及希望他们回答的

问题,这种方式明显借鉴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十分流行的点名游戏,只是少了原有的惩罚机制。从形式上来看,大多数口述者都是在被某一位或某几位同事点名后加入南都口述史的记忆工作中来。比如,南方报系的老领导范以锦就向李孟昱、刘陶和曹轲三人分别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分别谈谈筹办南都的具体细节、深圳封杀事件和当前的全媒体转型情况。曹轲也很快回应了范的点名,他在文章的开头就写道:“领导一阵子,老师一辈子。老师点了名,学生马上报到。”<sup>1</sup>当然,这种点名并不具备强制力。有些口述者没有向别人发出邀请,有些口述者则可能接到不止一个邀请,甚至也有口述者点名的对象根本不参加活动。笔者阅读和下载了所有的口述史纪录,共有50位讲述者出现在了页面上,经由他们的点名,更多的名字出现在了记忆空间中。可以看出,其中少数口述者是由负责这一新媒体项目的南都编辑邀约而来的,大多数则是在它被扩散后主动加入的。一般来说,口述者会邀请与自己有较多交集的同一层级、同一部门的人加入接力过程,但这些被点到名字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参与了点名游戏,将“南都家谱”接力下去。

其次,特殊的呈现机制。《南方都市报》在其官网上设置了一个庆祝创刊18周年的网页,包括有18年动态、18年18人等,南都口述史也是其中的一个专题,不过在PC端上只能阅读部分被精选出来的口述文章。若想完整地观看到所有的口述史文章,只能扫描网页上的二维码后进入微信平台上口述史的专门页面。笔者通过这种方式一共搜集到53条参与口述史的纪录,去除3条重复的纪录后,共有50人留下了纪录。然而很多条口述史纪录只有几个字或几句话,甚至只有一个虚拟的网名却无任何内容,无法为研究提供有效信息。最终笔者共筛选出28篇较有价值的纪念文本作为分析的对象。这些文本的字数有一定保证,较为完整地描述了口述者与南都这张报纸之间的关联。而且作者基本以实名示人,可以保障其口述的可信度。在这28人中,既有《南方日报》当年参与创办南都决策的高层,也有从南都开启一段职业生涯的一线采编人员,甚至还有只是在南都实习过的大学生,见证过南都发展的不同时期,而且几乎都已离开了南都。口述者身份的多样性也保证了叙述内容的丰富性。在这28位口述者中,多数经由对个体的职业生命史的叙述,阐述与《南方都市报》的关联,展开对《南方都市报》这个组织的纪念。但在具体的文本中,论述的内容又因这些讲述者在组织内的层级、地位、资历等特征不同而表现出不一样的叙事重点。下图为具体的28篇口述文章的标题、字数及其作者在南都供职时的职位或岗位。

上述两个特征表现出鲜明的新媒体色彩,增强了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互动性

作者	标题	字数	与南都的关系
苟骅	我跟南都的邂逅纯属一场意外	8399	南都深圳记者站记者
谭智良	回到1997——我的南都野史	1962	南都社会新闻记者
王星	记者下笔应如有千钧	1474	南都深度新闻部记者
王雷	南都安放了我的情怀	2359	南都深度新闻部记者
陈峰	“收容制度”成了我供职南都最重要的标签之一	2840	南都深度新闻部记者
卢嵘	离开不仅仅是为了回忆	2417	南都深圳记者站记者
李孟昱	南都的成绩是几代人付出和努力的结果	2313	南方日报社社长
刘陶	市场竞争倒逼我们创办南都	1721	南方日报社社长
程益中	南都要成为转型期中国的旗帜性读本	1746	南方都市报主编
王跃春	高举高打回击封杀南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861	南都深圳记者站记者
宋慕新	青春给了谁就是谁的人	4020	南都社会新闻记者
李民英	南都在深圳被封杀是绝好的发展机遇	2921	南都经营部门
谭军波	匆匆那年——我与南方都市报	6087	南都发行部门
范以锦	范以锦谈创办南方都市报	2590	南方日报社社长
曹轲	曹轲讲述南都全媒体转型	964	南都报系总裁
周皓	知善恶、有情怀、不懈怠	6449	南都广州新闻部记者
范春柏	南都社区新闻组我们的不老传说	1372	南都广州新闻部编辑
范国元	无题	1170	南都摄影部实习生
方常君	无题	2368	南都东莞记者站记者
何玉峰	老“南方”情牵《南方都市报》十八载	1043	不详
贺元甲	无题	705	南都数字传媒部
金杜	广州大道中289号，最美的时光	4020	南都财经新闻记者
李小玩	在都市报的时候	3395	南都娱乐新闻记者
廖洁	无题	804	南都数字传媒部
刘庆	无题	3744	南都时政新闻记者
刘晓明	无题	11966	南都经营部门
苏南	无题	558	南都数字传媒部
苑喜全	四十之后，重新出发	2182	南都经营部门

和主动性。最为重要的则是，能够或者愿意参与到南都18年口述史写作的人，通常都与南都有着较为亲近的关系，能够提供大量的个人化的细节，对于资料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有很大的帮助。通过南都口述史的个案考察，本文希望回答两个问题：第

一，这些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以及在不同时期与《南方都市报》发生关联的记者们在回忆中建构了一个怎样的报纸形象？第二，这种经由集体回忆建构起来的形象及其建构过程具有怎样的文化意涵？

### 三、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

在这28篇口述中，鲜明地表现出两种风格：一种着重于对南都这一新闻组织的历史生命的介绍，一种侧重于通过个人的职业生命史的回顾来展示与组织的关联。风格的差异与口述者的身份有很大关系。第一类口述者主要以南方报业和《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为主，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范以锦、刘陶、李孟昱、李民英，以及《南方都市报》的管理人员程益中、曹轲。除了曹轲外，其余口述者都亲身参与了创办南都的决策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往往将叙述的重心放在南都的创办历史上，描述其创刊的原因、过程及其间的历史细节，着重回顾了南都作为一个组织如何发展壮大过程。第二类口述者以《南方都市报》的一线新闻采编人员为主，他们在不同时期进入《南方都市报》工作。与前述报社的中高层管理者的回忆相比，一线的采编人员更多是从个体的职业经历谈论对南都的回忆，将他们在南都工作的经历当作一段重要的生命历程来讲述。如果说管理人员的回忆侧重于南都这份报纸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的话，那么采编人员的回忆则着重描述各种细节，比如如何进入南都、在南都的光辉时刻以及离开南都等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时刻。尽管在回忆的重点和叙事风格上有所不同，但是由于拥有共同的连接纽带——《南方都市报》，参与南都口述史的记者们构成了一个阐释性的记忆共同体<sup>2</sup>。这种阐释性表现在，他们不但针对着共同的对象南都在进行回忆，而且在叙事内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虽然由于在组织内承担的角色不同，管理人员和采编人员的回忆呈现出不同的记忆重点和叙述内容，却共同塑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报纸形象，在此过程中传达着他们理解的有关自身及新闻工作的意义。整体而言，经由口述者们的集体回忆，《南方都市报》被塑造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新闻业的媒介范例，其特别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南方都市报》被塑造为新闻业市场化改革的典范，不仅其创办的原因来自于市场的考虑，而且在办报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市场化的办报规律。根据程益中的回忆，“记得是1994年底，20年前，在南方日报总编辑刘陶的亲点之下，我参与到了以副总编辑范以锦为组长的南方都市报创刊领导小组，关键、张志光和我任副组长。”而根据范以锦的回忆，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办一个独立的报纸，而是要办南方

日报广州版。那时范以锦作为《南方日报》的副总编辑分管地方新闻部，部门主任关键提出想搞一个“大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版”，“名义上叫的是都市报，听起来名堂也很大，叫大都市报，但事实上它是附属在南方日报上去发行。”范以锦建议他们去向当时南方日报的一把手刘陶汇报。关、张、刘等人就在广州环市东路一家酒馆里谈，后来还出了一个“刘关张煮酒论办报”的美谈。“他们就问叫什么名字好，我说叫《大都市报》吧。因为那个时候河南有个《大河报》，所以我就不假思索的脱口来了个《大都市报》的名字，后来经过多次酝酿才最终确定为《南方都市报》。”关键和张志光开始还担心刘陶不同意，实际他们希望办一张城市型的报纸来吸引城市读者的想法，正与刘陶做大南方日报影响力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用刘陶的说法，创办南都“最直接的动因是市场竞争并倒逼我们思考要创办一份主打广州乃至珠三角城市群的日报”。广州是中国报业竞争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两家与《南方日报》的竞争给报社造成了很大冲击，《广州日报》凭借贴近性在广州市场有其天然基础，《羊城晚报》则深受知识界、教育界、科技界等领域的读者喜爱。“《南方日报》也在想方设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占领日益发展的城市读者群，但单靠《南方日报》和一周一期的《南方周末》远远不能适应竞争激烈的报业市场形势，于是尝试用一张全新的都市报在广大市民中打开局面就刻不容缓了。”据范以锦分析，当时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

在广州市场，我们南方日报原来的地位是非常巩固的，报摊卖得很好，固定用户也非常多。后来羊城晚报起来之后，我们南方日报就往下掉了；等广州日报起来了，我们就掉得更厉害了，在报摊上就越来越卖不动了。但我们又不能把全省的地方丢掉，集中打广州市场。因为我们是省委机关报，我们平时要面向全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占领广州市场靠什么呢？这是我们报社相当多员工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报社的领导班子，尤其是刘陶——当时我们的第一把手。他当时是我们的总编辑，经常思考南方日报怎样才能不把广州这个中心城市丢掉。

不过，新创报纸办得十分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上，“你一周才一期，你又不能做成南方周末那样，已经有南方周末，你不能重复。”另一个是发行上，当时发行量两千多份，其中有一千多份是范以锦拉来的。“我找了顺德一家银行的领导，领导说这份报纸不错啊，所有员工每个人订一份，就一千多份了。”报纸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正式刊号，所谓省刊号其实就是个内刊，不能刊登广告，在公开征订方面也有问题。李孟昱两次跑到北京去申请刊号，到最后还是没有跑

到。后来，不得已停掉了一家报纸《海外市场报》的刊号，让给了南都，此举也在报社内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做出这一决定的李孟昱坦承，当时的压力巨大。

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为日报的第一年我们的压力的确是非常大的，好多中层干部公开讲要“停掉南方都市报”。就是社委成员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像黄镜棠他就特别不高兴，因为黄镜棠是管海外市场报的，他不想停海外市场报。幸好当时我和范以锦意见都是一致的，就是比较坚决，要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下来。结果三年之内就扭亏为盈了，听说截止到去年南方都市报累计向集团贡献了20多个亿的利润。

其次，《南方都市报》被塑造为专业新闻范式的典范，不仅在报业市场上取得经济层面的成功，也因其不断在新闻业务方面的创新而在舆论市场扮演着相当活跃的角色。这一定位与报纸创办人的思路有着密切关系。时任南方日报文艺部编辑的程益中奉命参与新报纸的筹备工作，他负责的工作是研究全国各地的都市报、晚报，对全国的报纸改革和市场化的方向做充分的前期调研，并写出了他至今仍觉得很得意的办报纲要，“因为这份纲要奉行了报纸以及这个行业的基本常识和宝贵经验。”

我希望新创办的南方都市报不单是一份通俗的，或者是说市场上受欢迎的市民报，而是想让它成为能引领时代的、转型期中国、必不可少的旗帜性的读本，能够在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充当重要的舆论监督角色的报纸。因此，我在写《南方都市报》的办报纲要时，还写了比较详细的未来规划，如五年规划：第一年解“有与无”的问题，第二年解决“生与死”的问题，第三年解决“上与下”的问题，第四年解决“大与小”的问题，第五年“强与弱”的问题。而最后是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报纸。

在这个过程中，2003年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是充分体现上述办报纲要的一次“关键事件”。孙志刚报道是记者陈峰在“西祠胡同”BBS上偶然看到的新闻线索，但他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发表报道，根据在内地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他习惯于先去衡量一个报道的风险，而不是这个报道的新闻价值。采写过程始终得到了报社领导的支持，没有人说过这样的案件不可以报道，只是要求记者一定要采访扎实，用事实说话。2003年4月25日，报道一经刊出就引起巨大轰动，由于此后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这起事件也被塑造为中国新闻业的一个“神话”。

除了为南都带来巨大职业声望的孙志刚报道及其他深度报道外，南都开设的网

眼版也颇具影响力。这是南都当年新创的一个版面，主要报道网上发生的新闻或者说是线索来源于网络的新闻。王星是南都网眼版的第一位责任编辑，根据他的描述，虽然当时也有其他媒体开设了类似版面，但南都的投入最大：一是版面是比较黄金的A1叠封底，除非有整版广告，都固定在这个重要位置；二是人力，网眼版的主力记者都来自深度新闻部，是业务能力比较强的记者。当时的深度新闻部主任陆晖为网眼版定下了走舆论监督路线的总基调。“我们建立了一套网眼新闻的采编模式，行之有效，大家做的很开心，做出了很多独家首发的好新闻。每到各大媒体年终掐指盘点年度十大有影响力的新闻，有时候有五条以上都是南都网眼版首发的。”《南方都市报》在包括调查性报道、网眼、时政新闻、新闻评论等各个领域频频发力，这些都是南都在迈向主流大报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新闻产品。

第三，《南方都市报》被塑造为新闻业的“圣地”，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新闻理想主义者前来投奔。2002年，陈峰第一次加盟南都，在区域新闻部做了一个月的时政记者就回河南老家了。2003年第二次进南都，加入深度报道组，当时他已经是家乡《郑州晚报》的副总编辑，到底要不要辞职再次南下，非常纠结，直到一位好友对他讲：“如果你还想写点拿得出手的报道，就去吧。”这句话点醒了陈峰，“我已经年过三十了，如果这次不走，可能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与陈峰类似，一大批内地新闻从业者加盟报社。2002年夏天，宋慕新离开《齐鲁晚报》，投奔初享“报界黄埔”盛誉的《南方都市报》。他从广州赶到深圳记者站接受分管南方都市报新闻中心的副主编杨斌的面试，在展示了一摞调查作品、谈了五六分钟后，杨斌就说明天来上班吧。入职之顺利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与他此前在山东老家的经历完全不同。“从《山东商报》跳槽到《齐鲁晚报》，那可是参加了海选、考试、复试、面试、见习，一路肉搏厮杀，脱了几层皮才进去的啊。”如此轻松踏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让他半信半疑暗呼有诈，“后来才渐渐明白，南方都市报当时用人的方略是宽进严用，大浪淘沙，残酷磨砺，受不了的不必解聘自然会走人。”与之相比，王雷回忆的被录用的细节显得更为“草率”。2002年6月，他来广州前两天接到一个电话，被问了三个问题，对方随即让他到广州来一趟。这三个问题是：你的人事档案在哪，有传染病吗，什么时候能来广州。此时的王雷正值欲投身新闻事业却无门无人脉的阶段，这时《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杨斌给他打电话问了三个问题，“机会来得如此突然”。

创办早期的《南方都市报》在管理风格上还显得十分粗放，看似随意的进入方式却显示其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用宋慕新的话说就是，“南都当时正处于全面上

升期，广发英雄帖，网络了各路鬼神精怪。”南都虽然立足于广州本地，但其用人策略却是极具开放性的，吸引了很多来自其他地方的新闻理想主义者。有不少人舍弃了他处的工作，义无反顾地投入南都的怀抱。2002年，已在内地的一家报社做到了中层的范春柏从中国的最北端来到了广州，“从内地报纸的中层到普通编辑，从见过点世面的记者变成吃大排档的普通编辑，我很开心，终于不用活在别人眼光里了。”宋慕新、范春柏、陈峰、王雷等人在2002年左右加入南都时，报纸只是初步奠定了在都市报中的领先地位。但到2007年周皓加入南都时，“南都彼时已然名声在外，报社内外，满是传奇的人和事儿”，“进报社的时候战战兢兢，总觉得这里是新闻的圣殿，刚开始，很努力，可还是遭遇了很多批评，有的说文本不够好，有的说没有立意，有的说采访不够扎实，很多批评让我更加惶恐。”2009年他去采访汶川地震，冒着生命危险从汶川县城走了60公里山路进入映秀，部门主任看了稿子说写的跟游记似的，很不好，“请警醒”。这样的批评看似很不近人情，但南都就是这样一个“视业务为生命”的地方。虽然许多参与口述史写作的记者已经离开了《南方都市报》，但在这里工作的经历被他们当作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而感念。周皓的评价是，“回顾在南都的7年时光，还算没有辜负。”陈峰也感慨说，“作为记者，能有这么一段经历，能在南都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同行那么一小段时间，确实不能奢求更多了。”方常君也说，“离开南都，却时时心有牵挂，因为那是我青春岁月里抹不去的生命痕迹。”

这些口述者们在不同时期与《南方都市报》发生关联，并处在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不同层级，甚至广泛涉及到采编、广告、发行、设计等不同的工作岗位，势必会展现出不同的回忆角度和叙事策略，从不同侧面塑造着《南方都市报》的特别之处。然而，在创刊纪念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并且绝大多数口述者都已离开了《南方都市报》，他们把在南都的经历作为其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一段时光，因此口述者们的记忆工作主要着眼于彰显南都的功绩，回忆也是有选择性的，一些不太吻合庆祝气氛的事情就被忽略了，比如南都早期引人非议的小报风格、2004年南都案等。尤其是“南都事件”作为南方报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却只被一位口述者一笔带过，甚至程益中、李民英这样的当事人也绝口不提。这一事实表明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记忆实践依旧是有限度的。

#### 四、记忆工作作为边界工作

在不少口述者看来，《南方都市报》的人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其他报社的人一

般称呼该报为“南都”，而都市报的人则只会叫自己“都市报”，似乎天底下只有他们自己一家叫“都市报”一样。当记者在集体记忆中将《南方都市报》塑造为一家与众不同的报纸时，势必要与过去、与同行进行比较，并为此划出一定的边界。边界工作的概念最初被用来研究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构边界，新闻学研究则借用这个概念着重讨论发生在新闻业内外的危机或挑战(白红义,2015)。根据这些口述者们的回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南方都市报》孕育、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确立和巩固边界的过程。很多回忆往往围绕着具体的事件、报道、人物、现象等展开，涉及到何为好新闻、何为正确的新闻实践、何为恰当的新闻规范等新闻实践中的基础问题。

首先，在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办报方式之间划分边界。《南方都市报》在创刊伊始就被贴上了市场化的标签，其目标主要是立足广州、参与竞争，扩大南方日报社的城市阵地，成为继《南方周末》之后的创利大户。此前广州的报业竞争以三大报为主，虽然激烈却并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导致那时的媒体管理者和新闻从业者也并没有多少市场化办报的经验。程益中认为，《南方都市报》在发展的早期遇到的困扰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当时没有现在的企业观、投资观、发展观，甚至财务部门连财务预算都没有，延续了老的南方报社事业单位的形态，而不是一个现代企业。”因此，在每年亏损七八百万时，出现这样的言论并不令人意外。“当时很多部门的负责人质疑说，《南方日报》活得好好的，现在突然亏钱去办一个新报纸，搞这么一件事干嘛，南方报业的领导在一些骨干会议上也会遭到当众质疑。”

除了需要处理内部的复杂关系外，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竞争和排挤，其中最大的一次危机就是2001年5月9日的深圳封杀事件。李民英的口述史中集中回忆了此次封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在5月8日上午得知深圳两报联合邮政报刊发行局9日要封杀《南方都市报》，不允许在他们垄断的报摊零售《南方都市报》，让《南方都市报》从深圳零售报摊消失，甚至组织了稽查队上街检查。8日下午，李民英赶到深圳约见邮局负责人被婉拒，晚上报贩头们向他具体介绍了开会的内容。第二天，封杀真的开始了。没想到的是，我当天的报纸不是卖得少了，而是卖得更多，发行量大增。报贩把《南方都市报》藏起来偷偷卖，深圳的读者听到南都被封杀的消息后抢着买，一下子就抢光了。接下来被封杀的日子里，很多读者甚至主动到南都深圳办公室，要求义务帮《南方都市报》卖报纸，那段时间深圳连水果摊都在卖《南方都市报》。此后的事实证明，封杀事件反而意外地为南都提供了一个跨越式爆发的

机遇，以致于李民英开玩笑说，深圳的竞争对手封杀《南方都市报》，客观上成就了南都，他们确实是南都发展的“大功臣”。

王跃春当时担任深圳记者站的采编负责人。她记得5月9号第一天获知被封杀的消息，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做了6个版的专题“深圳有人悍然封杀南方都市报”。第二天又做了11多个版。“整个专题的采访是我组织安排的，花了半个小时时间写了采访方案，布置给所有深圳记者站的记者，大家的执行力超强。”多年以后，王跃春对当时的新闻操作方式也有反思：“事隔10多年回头看，以这样的方式来做报道，确实谈不上专业，但对于一张市场化的报纸，在一个如此奇葩的市场，以这样的方式高举高打，是正确的、唯一的迫不得已选择，‘一役拿下一城’也是必然的结果。”不过，对于当时的《南方都市报》来说，将报纸自身作为新闻主角呈现在报纸版面上并不会感到不妥，事件的轰动性具有足够高的新闻价值，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就是好新闻。在创刊早期，为了迅速打开市场，《南方都市报》在新闻操作方面采取了市场驱动新闻学（market-driven journalism）的运作模式，大量刊载社会新闻、暗访新闻，制造轰动效应，一度被戏称为小报。一个代表性例子就是1997年4月3日起，连续12天在头版推出《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这篇报道的作者是1997年即加入《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谭智良，他在口述中回忆说，初到南都时没有条线，走投无路之际想到此前混迹江湖颇认识一些人物，找分管采访部的副主编朱德付同意，写下了长篇纪实作品《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

“这篇文章在南都连载了十天，引起了轰动，内部也引发了争议，说这怎能算新闻？记得程益中和当时的责任编辑庄慎之还写了回应质疑的文章张贴出来，我第一次知道他们的字很漂亮。主管发行的谭军波也是支持者，他甚至在连载结束后安排出版了八个版的特刊，把文章一次性完整刊登，据说卖得很火。”

其次，在专业与非专业的新闻操作之间划分边界。2002年7月22日，宋慕新第一天上班，“顶着炎炎烈日，又淋着瓢泼大雨，采访一天，写了三千字，第二天见报，却只有700字的一条小稿。”他一度认为这条稿件的编辑卢斌实在过分。不过，等他在南都完成自己的“重新社会化”后，他的做法与卢斌如出一辙。“等我后来做了编辑，把新记者两三千字的车祸稿改成300字的图片报道。”“这一切，都是南都新闻价值观所决定的，足够重要的稿子如陈峰王雷合作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报道两个整版也不嫌多，但可以几句话说完的事情，真的就不允许罗里巴嗦。”甚至是看似不起眼的娱乐新闻、社区新闻，南都也展现出独有的特质。据曾光明回忆：

“99年的时候，内地娱乐新闻还是惨不忍睹的，我把全球各地的网上消息往版上一放，立刻是领先不少，最夸张的一次我看到广州日报的娱乐版，把我2个多月前翻译的一篇新闻照样登了出来，一般的海外及港台新闻，我们领先同城的报纸一个礼拜左右，而且我们开始做专题了。”

社区新闻的负责人范春柏每天担心的不是版面富余，而是稿件太多版面不够。南都的社区记者均匀分布在广州市区，“从接到报料到骑车到现场，就几分钟的事情，‘敌报’的记者乘采访车或的士到达时，现场毛都没有了。”

这样的专业素养也体现在不同记者回忆的采访经历中。创刊初期，由于缺乏足够的知名度，采访资源十分有限。刘庆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说服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先介绍《南方都市报》；然后开始进入当天采访的主题；结束采访的时候主动申请把带来的报纸送给周围的人，而且反复叮嘱要他们仔细阅读报纸。

“我知道很多人接受的时候是敷衍的，但我是有底气的，我相信只要他看一下，一定会被吸引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与其他报纸的确非常不同。这种不同来源于我们新的新闻理念，来源于我对新闻最本质的追求。当然这种底气更来源于每天都充满我内心的工作激情，而这种激情是《南方都市报》给我的。”

宋慕新加入《南方都市报》后的最初两年做社会新闻记者，“整天像疯狗一样四处狂奔”。2002年11月16日，番禺油轮起火爆炸，全城数家报社记者，只有宋慕新一个来自武术之乡的人翻墙进入现场，并在后来紧贴着现场办公的副市长一起听取救援汇报。“然而他们都讲白话，活脱脱把我听成了白痴，几乎带着哭腔追问人家说什么时，身份露馅被警察抓走喝茶。”正是因为这种博命精神，“南都社会新闻的张雨、王雷、陈实、林韬和我，被同行称为南都社会新闻的‘五虎’”。方常君曾在东莞驻站了10个月，“却是记者生涯中经历最惊险的时月。由于之前的厚街塌楼事件真相被南都揭露，致使主政官员下马，本就相当排外的东莞更加抵触南都，我们的工作就更为艰难。”她回忆了采访某建筑工地发生脚手架垮塌事件的经历。接到报料后，她便只身前往采访，一进镇区就有身穿“义务治安员”黄马夹的人上前阻挡并意欲搜身，后被带到当地公安局，亮明南都记者身份后，与对方持续了一下午的谈判，仍未获准采访。幸运的是，“摄影记者韩一鸣机智的突破了防线，在离故事现场不远的地方拍到了现场图片，发回了图片报道，保证了南都在重大新闻事件上不漏稿、不掉队。”其他南都记者也经常遇到这类现象，后来他们才知道，南都记者至少在东莞7个中心镇区都是被“挂号”的。

第三，在正常与不正常的媒体功能之间划分边界。程益中在撰写办报纲要时就要把南都打造成一张“能够在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充当重要的舆论监督角色的报纸”，《南方都市报》逐渐从早期的都市“小报”走向了有很强使命和社会责任的严肃报纸。许多口述者在回忆自己与南都结缘的原因时，都表达了只有在这里才能做真正新闻的成就感。他们对南都新闻文化的认可，潜在地对与之相对的新闻文化表示了抗拒。1999年末，供职于深圳本地一家媒体的王跃春下决心要换一份工作，她对这份工作的构想是，“一份真正做新闻的报纸。”当时她被这家报社派到罗湖区做驻站记者，“独自一人，拥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舒适、自在但毫无激情。”在王跃春下班回家必经之地的一个报亭，她开始逐渐留意到《南方都市报》的表现，当时在心里想“这份报纸若在深圳驻站该有多好。”不久，南都在深圳设站，她马上拿着招聘启事，到广州去找大学时的好朋友，然后通过当时的《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王景春递上了自己的求职材料，面试只有10分钟，“主考官”杨斌告诉她：“你被录取了。”王雷在加入南都前在内地待过几家报社，他回忆说，“当时我还是一个新闻新兵，但打心眼里经常和业界主流作抗争，虽然每月稿费刚够果腹，但从没把赚钱当作首要人生目标，后来有一个词描述这种状态，叫情怀。我的情怀是：当中国最好的记者。”只有在南都，他才找到了安放情怀的地方。在深度新闻部，他的第一篇报道是吉林省松原市官员带薪下海，第二篇是与陈峰合作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都所奉行的新闻观念吸引了不少人放弃内地的编制、职位加入南都。2002年4月，方常君从贵州来到广州，已经通过了广州日报的面试却仍心有不甘，直接找到《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杨斌面试时问她：“为什么要放弃正式编制？”方的回答是：“因为我在体制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觉得有些害怕和无奈；我喜欢折腾和挑战。”创业期的南都为类似不甘于陷入庸常状态的记者提供了舞台，“南都那时候的企业文化有这样的特质：你心生情意都会有负罪感。刚想歇口气，领导们都能察觉，‘啪啪’又给赶两鞭子。”跑突发新闻的宋慕新很快感受到工作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不适，但他依旧搏命采访，“主要的动力估计还是来自我老家水泊梁山的那种英雄气，正如我在每一个采访本扉页上写的八个字：替天行道，为民请命。”来自不同地域却怀有类似新闻观念的记者不断加入南都，在受到南都组织文化的熏陶时，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南都组织文化的形成。周皓回顾他在南都的7年就坦言，“它让我能分得清善与恶，多少有了一些家国天下的情怀”。

尽管许多口述者的记忆叙事都在从事着一定程度的边界工作，但随着《南方都市报》自身的发展情况，不同时期进入南都的记者们对于边界的阐释略有差异。

Gieryn(1983)概括了科学家进行边界工作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扩张(expansion)，即通过强调科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的优劣对比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进入被其他专业或职业占据的领域；第二种是驱逐(expulsion)，通过对竞争者贴上“假冒的”、“越轨的”、“业余的”等标签将其界定为局外人而逐出专业领域，实现权威和资源的垄断；第三种是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即将责任归咎于外来的替罪羊而使内部成员免于责任，阻止国家、资本等外部力量的干预。这三种边界工作的类型也被引入对新闻业的分析，因研究主题的不同而体现在参与主体、实践和专业主义三个不同层面(Carlson,2015)，并主要以分界(boundary-making)和维界(boundary-maintenance)的形式出现。口述者们对南都的回忆同样主要以这两种形式出现。在南都创刊的初期，它是作为报业市场上的“另类”出现的，比如它所奉行的新闻观、市场化的运营方式等都与既有的报业同行有很大的不同，记者们对于这段历史的回忆折射出的边界工作更像是一种对已有模式的“扩张”，从而确立自身作为新兴主体的边界。但随着孙志刚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报道的发表，进入全盛时期的南都已建立起在中国新闻业中的独特地位，记者们对于这段历史的回忆则表明边界工作的类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保护自主性”的努力，在与市场、政治等外部力量的纠葛中维系自己的“专业”边界。

## 五、结语

中国的新闻记者在生产大量新闻文本的同时，也在频繁地进行着职业性话语实践，围绕各类行业问题的讨论屡见不鲜，却很难形成多少基本的共识，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基于共同价值取向的所谓“阐释共同体”，但在一些分支领域却有可能产生相对一致的看法，比如基于共同的报道类型，在调查记者这个小群体之间形成一个阐释共同体；再比如基于共同从事的记忆工作，本文研究的案例就是《南方都市报》在其创刊18周年之际所设立的一个“南都口述史”的接力活动，在这个既封闭又开放的记忆空间里，一群记者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与这张报纸的密切关系，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阐释性记忆共同体。

在有关新闻业自身的集体记忆里，对于新闻组织的纪念是一种主要的记忆工作的类型，尤其是当新闻组织在庆祝他们的周年时。在这个“热点时刻”，记者们怀念他们的先辈、生产和消费他们的专业传统，宣扬他们在历史和社会上的角色(Olick,2014)。经由口述者们的集体回忆，《南方都市报》创刊至今的18年被塑造为一个中国新闻业发展的范例。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典范，《南方都市报》始终遵循

市场化的办报规律,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作为专业新闻范式的代表,《南方都市报》通过孙志刚事件等重要报道奠定了其新闻业务的水准,也因此被塑造为新闻业的“圣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闻人才加盟。记者们还在集体记忆中通过与历史、同行的比较确认了一些重要的新闻边界,比如对市场化环境下的办报原则和手段的坚守、对专业的新闻操作方式和规范的强调、对媒体社会功能的认知、强化自身共同体的联系等。边界的确立和维护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展现的边界工作的类型也有所差异,如果说早期是在专业性普遍较弱的状态下确立新闻的专业边界,那么现在就进入了一个需要持续与其他主体斗争而巩固专业边界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记者们围绕《南方都市报》创刊18周年所展开的记忆工作还应被置于当前状况的脉络内理解。在新闻生态发生巨变、传统新闻业日渐式微的当下,通过对这家报纸的创刊纪念,记者们在集体记忆中重申、加强乃至重建着新闻业在现代社会立足的核心特质。

就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研究而言,通过对南都口述史的个案研究,本文希望说明两点:一是对于新闻业自身集体记忆的重视。虽然新闻媒体是重要的记忆实践主体,但新闻从业者并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记忆学者也未给予新闻业应有的重视(Zelizer,2008);在新闻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媒介化记忆(mediated memory)的研究也通常聚焦于精英媒体对极端事件的报道,如战争、灾难、暗杀和革命等(Kitch,2008)。无论是利用过去阐释现在还是纪念已经发生的事件,记忆始终存在于新闻话语中,但记忆也会发生在记者讨论他们的专业时(Carlson & Berkowitz,2014),记者对于自身行业的集体记忆同样重要。二是对集体记忆中记者作用的重视。与记忆研究中对新闻业的漠视或轻视一致,新闻记者的记忆工作的主体作用也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然而,记者通过特定的话语实践在集体记忆的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管是针对重大事件的公共记忆,还是针对新闻业本身的行业记忆。鉴于记者的新闻实践与记忆工作之间存在相当多的共性,了解记忆如何运作也成为理解记者专业实践的不可或缺的内容(Meyers,2007)。对记者来说,记忆不仅仅是回顾过去,它还构成了记者作为一个阐释共同体理解自身的核心内容(Carlson & Berkowitz,2014)。

本文的不足在于,这是一个在特定时期特定平台上发生的记忆实践,记忆的发生、呈现和阐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至少有两点未能展开充分的讨论,一是新媒体作为记忆空间对记忆实践本身的影响;二是当下的报业“危机”作为记忆发生的社会脉络对记忆实践本身的影响。在新媒体环境下,记者的记忆工作开始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记者们的记忆工作越来越频繁出现,涉及到新闻人物、组织和事件

等不同记忆对象；除了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图书之外，各种新媒体平台成为重要的记忆场所；记者们的记忆工作往往勾连起过去与现在的新闻环境，置于当下的脉络内才能更好地理解回忆的意义。这些新的特点为我们开展新闻业集体记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责任编辑:方惠)

### 注释 [Notes]

1. 文中引用的口述者的叙述均出自“南都口述史”，不再一一注明。
2. 本文中的记者是泛指。参与南都口述史写作的除了大量新闻采编人员外，还有少数从事管理、发行、设计和广告的工作人员。

### 引用文献 [Reference]

白红义(2014).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6),46-60.

[Bai, Hongyi(2014).Journalistic authority,occupational ido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A study on the memorializing discourse of Jiang Yiping's retir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6),46-60.]

白红义(2015).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新闻记者》,(7),46-55.

[Bai, Hongyi(2015).Journalistic boundary work: concept, types and problems. *Journalism Review*,(7),46-55.]

郭恩强(2014).多元阐释的“话语社群”：《大公报》与当代中国新闻界集体记忆——以2002年《大公报》百年纪念活动为讨论中心.《新闻大学》,(3),18-25.

[Guo, Enqiang (2014).Ta Kung Pao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ism's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ism Bimonthly*,(3),18-25.]

李红涛,黄顺铭(2015).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新闻记者》,(7),36-45.

[Li, Hongtao&Huang, Shunming(2015).News production as memory practice. *Journalism Review*,(7),36-45.]

施喆(2000).从首届记者节报道看中国记者的专业主义和职业意识.未发表.

[Shi, Zhe (2000).Chinese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ism and occupational ideology in the First Journalists' Day news reports. *Unpublished.*]

王悦,李立峰(2014).记者心中的角色模范及其影响初探：香港个案研究.《新闻学研究》,(119),1-43.

[Wang, Bess &Lee, Francis (2014).Professional Role Models of Journalists and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of Hong Kong.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19),1-43.]

- 张志安,甘晨(2014).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业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55-77.
- [Zhang, Zhi'an & Gan, Chen (2014). A Case Study on Chinese Journalistic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y Told by the Journalism and on the Journalism.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 55-77.]
- Berkowitz, D. & Gutsche, R. (2012). Drawing lines in the journalistic sand: Jon Stewart, Edward R. Murrow, and memory of news gone b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9 (4), 643-656.
- Carlson, M. (2007). Making memories matter: Journalistic authority and the memorializing discourse around Mary McGrory and David Brinkley. *Journalism*, 8 (2), 165-183.
- Carlson, M. (2012). Rethink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Walter Cronkite and ritual i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13 (4), 483-498.
- Carlson, M. (2015). Introduction: The man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In M. L. S. C. Carlson,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arlson, M. & Berkowitz, D. (2012). Twilight of the television idols: Collective memory, network news and the death of Walter Cronkite. *Memory Studies*, 5 (4), 410-424.
- Carlson, M. & Berkowitz, D. (2014). The late news: Memory work as boundary work in the commemora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ts. In B. Zelizer & K. Tenenboim-Weinblatt, *Journalism and Mem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Gieryn, T. F. (1983).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6), 781-795.
- Gilewicz, N. (2015). To embody and to embalm: the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final editions of failed newspapers. *Journalism*, 16 (5), 672-687.
- Kitch, C. (2008). Placing journalism inside memory--and memory studies. *Memory Studies*, 1 (3), 311-320.
- Meyers, O. (2003). *Israeli journalism as an interpretive memory community: The case study of haolamhaze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 Meyers, O. (2007). Memory in journalism and the memory of journalism: Israeli journalists and the constructed legacy of haolamhaze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4), 719-738.
- Olick, J. K. (2014). Reflections on the underdeveloped relations between journalism and memory studies. In B. Zelizer & K. Tenenboim-Weinblatt, *Journalism and Mem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chudson, M. (1992).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elizer, B. (1993). Journalism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3), 219-237.
- Zelizer, B. (2008). Why memory's work on journalism does not reflect journalism's work on memory. *Memory Studies*, 1 (1), 79-87.